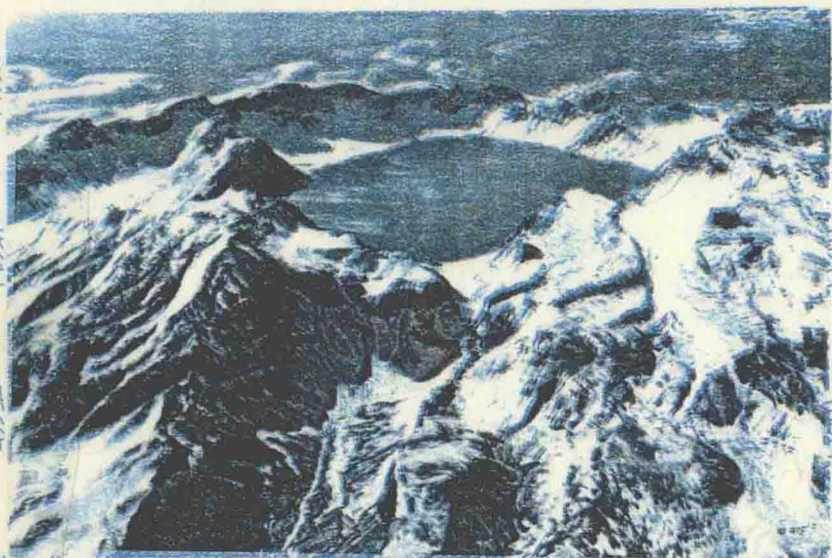


箕子与朝鲜论集



对辽西发现五千年前文明曙光的历史蠡测

中华文明起源渊远流长，是由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最后结成中华文明的一体结构。早在五千年前东北就与我国中华文明的起源历史结合在一起。在其文化发展中，既与整个中华文明的起源结成一体，又通过它与东北其它民族与文化结成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辽西发现距今七千年前到五千年前的红山诸文化遗迹，被称为是“我国文明黎明”或“文明曙光”时期，并把这种古文化作为“古城古国”重要课题提出研究。我曾根据史书记载把距今四千年前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与殷先世的历史结合起来研究，认为殷人起源于辽西地区。但是现在又对比夏家店下层文化早，而且又属于同一文化系统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两种文化类型的红山文化有崭新的发现，这就不能不使我作进一步的设想：辽西发现的五千年前的文明曙光，即史书记载中的“颛顼之墟”。我认为中华民族古文化的起源是多源的，众多的源和流汇成中华民族文明灿烂之花。最早它通过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系统，在地区聚集和融合而发展起来中华文明曙光，然后再向中原聚集，又经过长期的接触、汇聚和交融，形成以黄河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摇篮，反过来它又影响各地区文化的发展。

历史事实证明，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文化外来说已经破产，而中华各地区的民族和文化都起源于中原，如东北古代民族都是“中原来客”，东北古文化都是“中原传播”，似亦应再作新的探索。为此，再就史书记载对在辽西发现的五千年前文明黎明时期的历史，讲一些看法。

一、“颛顼之墟”在辽西

在说明红山诸文化的遗迹是“颛顼之墟”前，需讲明一些历史情况。

我认为中华人类的起源不在中原，而在中原的四周。从已发现的旧石器早期人类化石和遗址看，北京猿人在北京西南周口店，蓝田猿人在陕西蓝田县，元谋人在云南元谋县。从旧石器早期遗址看，大致分布在东北南部、河北北部、内蒙、甘肃、山西、湖北，以及长江流域有旧石器早晚期不明的遗址。从河南渑池东到山东沿海均无发现，就是旧石器中、晚期的遗址也很少被发现^①。从史书记载和后人的考证看，太昊、少昊属于东方夷族的祖先，在今山东，风姓。《春秋命历序》：“遂人出暘谷，分九河”。《尚书·尧典》：“宅嵎夷曰暘谷”。《史记·夏本纪》“索隐”，谓《今文尚书》及《帝命验》并作嵎铎，在辽西。嵎夷，《史记·五帝本纪》作郁夷。甲骨文“有”字作“𠂔”，“𠂔”从又作“𠂔”，𠂔是国族名也是地名，郭沫若推定在安阳北千里而遥^②。今辽宁喀左在安阳北约千里。《诗·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翦伯赞以为有截是氏族名，又是地名，在东北^③。《集韵》铎作𪔐，截当是𪔐之省，有截即有铎，亦即郁夷、嵎夷。《说文》山部：“𡵓山在辽西，从山易声，一曰嵎铎，暘谷也”。遂人出暘谷，实在辽西。《易通卦验》谓遂人氏风姓，在伏羲（太昊）前。《帝王世纪》：“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风即凤，东夷、东北夷有共同的以鸟为图腾的传说，均起源于北方暘谷。在今山东西南大汶口出土陶器上刻辞有“𪔐”、“𪔐”字。日下从火，即炅。于省吾释为“旦”字，于理不通。李白风《东夷杂考》认为是昊，即“昊之本字”，属太昊、少昊时物。唐兰认为是五千八百年前之物^④。𪔐是昊山二字合文。昊与皞通，皞为山名。昊作皞、皞。昊山合文即皞，《玉篇》：“皞，山名，本作皞”。皞山即太昊、少昊所居。

少昊之外有赤帝、黄帝。赤帝神农，赤字篆书与炎相似，误为炎，实是赤，出自西方羌人，姜姓。黄帝，据考订为西北之狄人，有人认为出自赤狄，姬姓。他们都是西方和西北方的族。

蚩尤、祝融，被称为炎帝，蚩尤也是姜姓，可能出自西南姜人。祝融历来被视为南方系统的族，当出自南或东南。

各地区文化兴起都不是单一的，是多系统的文化在当地地区的聚集、交融和再创造而形成的一种有代表性的地方文化。就东北地区而言，有来自辽东夷人的新乐文化，有来自北方戎狄的富河文化，还有彩陶文化传入，他们经过接触、汇聚和交融再创造为红山文化。

在历史上有一个时期，中原不适于人类生存和文化的创造，那就是冰河时期。更新统末期，由于喜马拉雅（珠穆朗玛）山突然隆起而出现冰河期，华北的气候寒冷，许多地方都发现冰川和冰水的沉积，表明第四纪时今华北和华中有冰川存在，至少是山麓冰川分布范围很广。冰川融解便是洪水，积成湖泊和大河。

洪水期最早进入中原的是共工。《国语·鲁语》：“共工氏伯九有（即九州）。”《礼记·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平水土），故祀以为社”。《管子·揆度篇》：“共工之生，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九州的州字即水中陆地。共工当是西方羌人中最发达的部落之一，他由西而东首先进入山西黄土地带，然后再步入中原，他的历史是和治水而始终的，是第一个征服中原地区洪水的英雄部落。时间大约在七千年前。在共工进入中原后，其他在各地的原始部落也同时在聚集当地各系统文化而发展，他们也先后在向中原聚集，因之历史传说中出现神农、黄帝、颛顼、帝喾等与共工争斗之事。

在共工据有中原而发展之时，据史书记载“颛顼之墟”不在中原，而在辽西。

（一）《太平御览》卷一五五引《帝王世纪》：“颛顼都亳”，“喾居亳”。《史记集解》引孔安国：“契父帝喾都亳”。《竹书纪年》：“颛顼

居濮”。旧谓濮阳，按濮乃亳之音异写。《水经注·渭水篇》引《世本》：“契居蕃”。《太平御览》卷一五五、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历代都邑考》并引作“契居番”，番与亳为同音，通用。由此可见，颛顼、帝喾、契之原住地在亳。亳地在哪里？《左传》：“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肃慎是东北族。燕亳即殷亳。《吕氏春秋·坠形训》：“东北薄州曰隐土”。《河图括地象》亦云：“东北薄州”。薄州即亳。古隐与殷字通，隐土即殷土。殷亦读为燕，亦即燕土。《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契所生地为殷土，亦即东北薄州之地。《列子·汤问》：“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张湛注：“《淮南》云：‘东北得（薄）州曰隐土’”。渤海亦称北海，即今之渤海，是证隐土（殷土）在今东北无疑。古颛顼所居之亳即在此。

（二）《吕氏春秋·古乐》：“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居空桑，乃登为帝”。吕思勉《先秦史》引王筠之说：若字就是桑，《说文》艹部：“𦵏，日出东方汤谷，所登榑桑。桑，木也”。若水即日出东方汤谷之地。若水即桑水，所谓空桑、穷桑之桑应与此有关。东夷太昊风姓，遂人亦风姓出暘谷，《古史考》少昊“宗师太昊之道”，“遂济穷桑”^⑧，“邑于穷桑”^⑨。确有共同的起源地关系。

（三）《太平御览》引《世本》：“相土徙商邱，本颛顼之墟”。又引《帝王世纪》：“商契始封于商”。宋衷云：“相土就契封于商”。《诗·商颂·长发》：“帝立子生商”，商即契。契都亳，则契始封于商即亳。颛顼、帝喾、契皆居亳，“相土徙商邱，本颛顼之墟”，亦即亳地。

（四）《左传》昭公十七年：“卫，颛顼之墟也”。《水经注·子河篇》：“河水旧东决，径濮阳城东北。故卫也，帝颛顼之墟。昔颛顼自穷桑徙此，号曰商丘，或谓之帝都。本陶唐氏火正阼伯所居，亦夏伯昆吾之乡，殷相土又都之”。成汤始得昆吾之地，而远在海外之相土何得居于此？如是此卫之“颛顼之墟”当作另解。《吕氏春秋·慎大览》：“亲鄩如夏”。高诱注：“鄩读如衣，今兖州民谓殷民皆曰衣。”又《有始览》：“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鄩、卫是同一字的异体。《尚书·康诰》：“殪戎殷”，《礼记·中庸》作“壹戎衣”。郑注：“衣读如

殷，齐人言殷声如衣”。郛读如衣，衣读如殷。则郛、卫亦即殷土。郛、卫（殷）之原住地在辽西。

（五）王先谦《汉书杨雄传补注》引《庄子》，“夫道，颛顼得以处玄宫”。《汉书叙传》注：“颛顼北方水位，故称玄”。玄指北方，如北方曰玄天，契在北方承黑帝而主称玄王。北方鸟称玄鸟。颛顼之胄，称玄胄。有絨氏之女于玄邱水，吞卵生契，玄邱水，即今青龙河。《淮南子·应道训》：“卢敖游乎北海，经乎太阴，入乎玄阙，至于蒙谷之上”。北海，今渤海，太阴青龙，玄阙即颛顼所处。蒙谷，旧注为山名，按即后来之蒙古山，或作梦哥山，在此指今大兴安岭之南段^⑦。

（六）《荀子·成相篇》：“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砥石，即《淮南子·坠形训》“辽出砥石”的砥石。据高诱注及《水经注》砥石山是辽水发源之山，古统称今西拉木伦河、西辽河、辽河为辽水，砥石山即今西拉木伦河发源之白岔山，亦称光头山。昭明由砥石迁于商之商，即“颛顼之墟”。

（七）《晋书·慕容廆载记》记载大棘城是古“颛顼之墟”。大棘城，在今辽宁省锦州市。《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昔高辛氏（帝喾）游于海滨，有少子厌越以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紫蒙川今老哈河，其子厌越当即契。其地亦在辽西。

（八）箕子适朝鲜，童书业谓嵎夷即朝鲜，《说文》云嵎夷在辽西。《隋书·裴矩传》记载，孤竹国“周代以之封于箕子”。《庾开府集·周陇右总管长赠少保豆卢公神道碑》：“朝鲜微（微为“箕”字之误）子之封，孤竹伯夷之国”。在辽西发现的箕侯器与孤竹器出土迹近可证。孤竹在辽西，即殷先人所居的殷土。孤竹姓墨台氏，即殷子姓其后分封的目夷氏，目夷即《周易》“箕子之明夷”的明夷地。嵎夷、朝鲜、目夷、明夷就地域而言，为同一地区的同名异写。

以上所载，并非一时的、个别的、杂而无章的记载，当有文字可据，口碑所传，因此我们认为“项颛之墟”在辽西。

二、从颡顼、帝喾事略看辽西五千年前遗迹

“颡顼之墟”在辽西，那么与辽西发现五千年前红山诸文化的遗迹有无史事上的联系？这是有必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文献关于颡顼、帝喾时的记载极为概括而且是不全面的，远不如出土的遗迹那样的丰富和生动。但从主要的方面，文献记载仍可与考古发现相印证，相补充。

（一）从文献记载看，辽西发现五千年前遗迹与颡顼、帝喾的时间大体吻合。《春秋命历序》记载颡顼高阳氏传二十世，三百五十年；帝喾传十世，四百岁（《祭法疏》引）。又《通典》所引：“颡顼传九世，三百五十年；喾传十世，四百年”。从颡顼所传世看，二书所引不同，而所传年数无异。颡顼、帝喾所传共七百五十年。

史载殷人始祖契与颡顼、帝喾属同一个系统，在卜辞中帝喾写作𠩺，被称为“高祖”。此字所释不一，郭沫若释为喾，杨树达释为离（即契），或释为俊、夔。喾传世后为契，契是尧舜时人。法国人卑奥据东汉马融以前对《尧典》“四仲中星”的解释，是一方并见，不是单独一星，他推出公元前二三五七年的二分二至所在点，确是与《尧典》符合^⑧。一般推算尧舜是公元前二十三世纪。由此从尧舜往上推七百五十年，则恰当五千年前。苏秉琦先生推定红山诸文化约从距今七千年到距今四五千年间^⑨，则与契以前的颡顼、帝喾两个阶段的时间更为接近。

（二）《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颡顼“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后汉书·天文志》记载星官之书，始自黄帝，“至高阳氏（颡顼）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颡顼时已知历法和祭祀，在辽西发现的祭坛有长方形祭坛在北，圆形祭坛在南，此与“祀天寰丘（在南），祀地方丘（在北）”正合。此制之产生当与颡顼时始“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有关。从实物看当时对天地的形体已有天圆地方的原始认识，从文献记载看当时职司天地的确有南正、北正之分，关于五千年前颡顼的记载，可以说得到

实证。

(三)《礼记·月令》：“以大牢祠高谋”。注：“高辛(帝喾之世)，玄鸟遗卵，娥简吞之而生契，后王以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变媒言谋者，神之神也”。疏：“谓后代之王，立此高辛而为谋神也”。按疏复引蔡邕说，以为谋神是高辛之前旧有。高谋也叫郊谋，郊谋就是立宫于郊外的谋神。《诗·大雅·生民》：“以弗无子”。传：“弗，去也，去无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谋焉”。陈奂传疏：“郊谋，即谋，宫于郊故谓之郊谋。帝高辛氏已有之，故传云古者必立郊谋焉也。周人以帝高辛妃姜嫄，立其庙以为谋宫，故又谓之高谋”。在辽西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女神和庙，被称为“女神庙”。依据古书记载，我国古代的习俗称“神女”。不称“女神”。《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玘注：“女媧，古神女而帝者”。《路史·后妃二》，罗苹注引《风俗通》：“女媧祷祠神，祈而为女媒，因置昏姻”。同书：“以其(女媧)载媒，是以后世有国，是祀为皋谋之神”。各族各以神女媧为神谋，立祠以祀。殷人称高谋，周人称高谋之宫为闾宫。故称神女为女媧不误。《路史·余论》：“皋谋古祀女媧”。所谓女神像就是郊谋或高谋，庙即谋宫。史载辽西为“颛顼之墟”，在辽西所发现的“女神”即女媧，也即颛顼、帝喾、契居亳地的高谋及谋宫的遗存。

(四)《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契)。”。毛曰：“玄鸟，𪚩也，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娥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祁于郊谋，而生契，故本为其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也。”郑曰：“天使𪚩下而生商者，谓𪚩遗卵，娥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说文》：“𪚩，玄鸟也，齐、鲁谓之乙，取其鸣自呼，象形，凡乙之属皆从乙。𪚩，乙或从鸟”。玄鸟、乙即燕。

在红山文化陶器上有明显的“之”字纹，之字纹与𪚩形相近似，而与甲乙之乙字更相类。红山文化出土的玉鸟、玉鸛多作“M”形，而之字纹的连缀即成𪚩纹，即𪚩字。《说文》：“𪚩，小也，象子初生之形”。𪚩是玄鸟之子，与玄字相似。𪚩有身有头无翼，象燕初生之形，𪚩字则增翼。卜辞中的子字作𪚩、𪚩、𪚩，有首、有尾、有翼，尚未

丰满的初生形(俱见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在晚于红山文化的小河沿文化中不见红山文化中普遍流行的“之”字形纹,但在已发现原始文字中有乙、𠂇、𠂈^①,可能是乙、𠂇字的初文。

殷人祖先有卵生说,以燕为图腾,在红山文化中普遍流行的“之”字形纹,可与之相印证。这对当时殷先人影响是很广的。姓为子姓,鸟为玄鸟,地为玄宫,《周礼·职方氏》:“东北曰幽州”。幽字从山中从𠂇,山得名于𠂇。冀为北方,畿与冀州的冀通,象人荷戈于𠂇地,其字也与𠂇有关。

(五)《左传》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阍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红山文化的彩陶纹饰三角涡纹图案,刘敦愿谓与火字有关,亦即与火龙有关^②。《五音篇海》有𠂇字,读音为燕。𠂇象燕之初形,其字与幽州之幽从𠂇同。𠂇,即主大火之阍伯。

(六)《淮南子·齐俗训》:“帝颛顼之法,妇人不辟男子于道路者,拂于四达之衢”。注:“拂,放也,遼吉按《太平御览》引拂作拔,有注云,除其不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见到颛顼为男子责打女子所立下的规矩,是父权制确立后的产物。在辽西遗址中发现的玉龙,据研究玉龙的龙是象征着父权的。龙象征着男子,凤象征着女人,这种原始意识的萌芽可能始于颛顼父权制确定之后,传说的帝喾的老婆简狄要生下天帝所命的契,需有玄鸟(即凤)为媒介,这样天上的神物经鸟的媒介而生就变成人间上帝所立之子,那么男性的帝喾、契自然就是龙的象征。这在《潜夫论·五德志》中透露了这个消息:“有神农首出常羊,或妊姁,生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农,代伏羲氏……后嗣庆都,与龙合婚,生伊尧,代高辛其氏,眉八彩,世号唐”。《世本》帝喾老婆陈鄴氏之女庆都生帝尧,庆都与龙合婚的龙则为帝喾。玉龙在辽西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它代表着父权,是父权的象征,结合“颛顼之法”当是可信的。

(七)辽西红山文化,据研究当时社会处于一个重大变革时期,正迈入以地域为特征的部族制时期。这样的一种历史时期也和文

献记载的颛顼吻合。《礼记·月令》疏引服虔曰：“自少皞以上，天子之号以其德，百官之号以其徽。自颛顼以来，天子之号以其地，百官之号以其事”。《左传》昭公十七年：“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能纪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汉书·百官公卿表》：“自颛顼以来，为民师而命以民事，有重（天）、黎（地）、句芒（木）、祝融（火）、后土（土）、蓐收（金）、玄冥（水）之官”。应劭注云：“始以取事命官也”。

颛顼时由过去以其德、以其徽变为以其地、以其事，这是由原始的氏族部落制向以地域为特点的部族制的重大变革。这种变革一般地讲是发生社会生产力总发展之后。颛顼以来的变化，标志着其社会已进入原始社会的末期，孕育着阶级社会的诸因素的增长，由分散的地域性的部族的统一便进入文明的世界。从辽西红山文化遗址中看到文明曙光，恰与文献记载颛顼以来社会的新变化是一致的。这些变化在颛顼前未曾出现过，因而最早进入中原的共工诸部，大约也不会早于颛顼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

三、对颛顼以来若干史事的再认识

颛顼、帝喾时已进入以地域为特点的部族制时期。部族制发生在原始社会的末期，是由原始的氏族部落制到统一的民族和国家出现的过渡时期。

部落联盟的发展是多层次的，首先是由若干部落结成亲近的部落联盟，并经由它发展为以地域为特点的部族制，开始是分散的，进而再以一个作为核心的部族统一他部族而形成地方的大的联盟。最后由一个作为核心的部族把地方的大、小部落联盟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军事部落联盟，并经由它发展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和国家。军事部落联盟是亲近的部落联盟发展的高级层次。

从颛顼起，已由以地、以事为特点的部族制代替氏族部落制。《左传》文公十八年：“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敫、栲𣪠、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

谓之八恺”。又：“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高阳氏颛顼、高辛氏帝喾各有八族，这就是说他们是由八族结成一个部族。从辽西红山文化遗迹看，当时已出现凌驾于社会一般成员之上、拥有很大权势的首领一类人物^⑧，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社会组织形式^⑨。从文献记载看还不仅如此，颛顼、帝喾的部落联盟还包括其他地方的大的联盟的结合。如属于共工系的“九州”、蚩尤系的“九黎君”、祝融系的“八姓”都与颛顼、帝喾结成联盟。当时似乎已在各显贵的家族间结成婚姻，《史记·五帝本纪》：“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嫫母氏女，生挚”。《世本》：“帝喾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元妃，有邠氏之女，曰姜嫄，是生后稷；次妃，有嫫戎氏之女，曰简狄，是生契；次妃，陈鄆氏之女，曰庆都，是生帝尧；次妃，嫫母氏之女，曰常仪，是生帝挚”。有邠氏、有嫫戎氏、嫫母氏、陈鄆氏，应是与帝喾一族世婚的家族，实行的是不同姓的世婚制。

舜与帝喾的关系，《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颛顼——穷蝉——敬康——句望——桥牛——瞽叟——重华（即舜）。舜之先穷蝉与帝喾皆为颛顼之子，穷蝉与帝喾为兄弟。《史记·五帝本纪》：“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左传》昭公八年：“自幕至于瞽叟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杜注：“幕，舜之先也，从幕至瞽叟无违天命废绝者”。《国语·郑语》：“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又《鲁语》“幕能率颛顼者也，故有虞氏报焉”。依此舜为东夷之人。亦属于颛顼一系。文献记载帝喾之后为帝挚，帝挚之后为帝尧。挚与尧皆帝喾之子，帝喾传十世，无其子挚，尧相嗣承之理，所谓子或指其直系子孙。如果这些记载有道理则在颛顼、帝喾已形成在其家族中世选军事部落联盟酋长的制度。

尧、舜、禹是部族制向统一民族、国家急剧转变时期，在一个家族内的世选（禅让）已经破坏，向世袭制转变。《括地志》：“《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

见也”。《韩非子·说疑》：“舜偁尧，禹偁舜，人臣之弑其君者也”。

在颛顼之后的族属关系中独不包括禹的先人，而商、周是包括在内的，即契与后稷都是帝喾的后人。禹原出自西方羌人，禹平水土，咸有九州，禹应属于最早进入中原的共工的族属。共工据有中原后，经营水中的陆地以发展自己，后来附于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以治水。共工部落在中原汇合各方面的文化而发展，禹之先人鲧于尧、舜时为侯伯，后来禹兴起，第一个建立奴隶制国家。从夏朝开始，中原各族文明发展的摇篮便汇集在黄河流域。

在夏王朝建立的前后，辽西红山诸文化的发展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即夏家店下层文化，当然这两种文化之间应有它的过渡期。夏家店下层文化所显示的已不再是红山文化的文明黎明时期，而是进入“文明昌盛的时期”^③。从已发现的密集分布在河谷地带的村落、防御设置以及由“一大几小”土城堡聚落构成的有机群体，可能还有高于这些群体的更高级的聚落存在^④。当时可能在燕山南北存在着一个与夏同时而又巨属于夏的古国。这个古国就是商，对夏则为“商侯”，起源于辽西。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晚期已进入燕山以南，与夏接界，进而灭夏，进入中原，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基础上与夏文化结合形成商文化。

夏家店上层文化与夏家店下层之间应有衔接的关系。当殷先人南下进入中原，则留在这里的另一族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基础上发展，其族当是与殷有关系的戎人，即东胡的先人。夏家店上层文化在殷末则有另一支殷人箕子进入东北，这样便出现东西各有不同特点的两种青铜短剑文化。在辽河东西的是属于朝鲜侯国的文化。

通过对辽西五千年前文明曙光的历史蠡测，至少得出这样的一些认识：辽西曾是中华民族文明起源地之一，在五千年前这里曾放射出中华民族文明的黎明曙光；五千年前在辽西发生我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变革时期，以地、以事为特点的部族制和历史上最早的“颛顼之法”在这里实行；殷人起源于辽西，并在东北古史上第一

次步入中原代夏而成为中原的统治民族,它以当时最先进的文化促进华夏族及其文化的形成。辽西考古的功绩,就在于它使已被人们遗忘和因历史偏见而被掩盖了的事实,重新用丰富而生动的遗迹再现当时历史的真象,并以此为据辨明文献记载的真伪使历史的研究更接近真实。

注:

①请参看《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原始社会早期遗址图(旧石器时代)》。

②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41、342页。

③翦伯赞:《殷族与史前渤海系诸氏族的关系》。

④见李白凤:《东夷杂考》引。

⑤《左传》昭公29年。

⑥《尸子》:“金天氏(少昊)邑于穷桑”。

⑦《黑鞑事略》:“沙漠之北有蒙古山”。《元史》作蒙可山、梦哥山,即今之兴安岭。

⑧束世徵编辑《中国通史参考资料选辑》第一集《原始时代》,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3月版,第148页。

⑨⑬⑭⑮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文物》1986年第9期。

⑩李恭笃、高美璇:《试论小河沿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

⑪干志耿等:《商先起源于幽燕说》,《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

⑫孙守道、郭大顺:《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86年第8期。

殷人的起源地与孤竹国

箕子是殷人，在研究中有箕子东迁是回到殷人老家之说。殷人的起源地与孤竹国是研究箕子适朝鲜前，殷人在东北及殷时东北侯伯国的存在，乃至同对箕子适朝鲜之地的研究有密切关系。

一、关于殷人的起源地问题

关于殷人的起源地，是研究殷人起源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金景芳在《殷文化起源于北方说》一文中认为：殷文化起源于内蒙古昭乌达盟，燕亳、砥石是殷人重要的文化发源地、商汤在灭亡夏的北方屏障韦、雇、昆吾以后，才平步中原。在今河南中部，不可能有“商代先公时的文化”，或“商代早期以前的文化”。^①我基本上同意这一见解。现将主要理由申述于下：

（一）殷人始祖契起源东北

《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皇甫谧云：“帝誉名夔”。《礼记·祭法》：“商人禘誉而祖契”，《国语·鲁语》则作：“商人禘舜而祖契”。舜即夔之转。孟子谓：“舜，东夷之人也”。故云殷人原出自东夷，不无原因。

夷与北方族人关系极为亲近，北方诸族尚黑，《尸子》：“舜墨”。《诗·商颂·长发》笺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谓契为玄王”。黑帝是北方神，玄意为北方。夷“承黑帝而立子”。故亦称玄王，其地为玄土。

简狄为有娥氏之女，顾颉刚认为有娥氏在东北。《淮南子·坠

形训》：“有娥在不周之北”。同书又谓：不周“在海隅”。海隅即海岸。度其地当在今河北东北、东北西南古燕、幽境内。

《广韵》引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高辛氏即帝喾，厌越当即契。《读史方輿纪要》：紫蒙，在今朝西北老哈河赤峰一带。东胡之先为山戎，传说殷人先世与戎人关系至密，因周人称殷人为“戎殷”、“殷戎”、“戎商”。殷人祖先曾居于戎人之地，结成互为婚姻部落，亦非俱出虚构。

（二）殷人先世活动在东北

《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指契），宅殷土芒芒”。《淮南子·坠形训》：“东北薄州曰隐土”。隐与殷音义同，隐土即殷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是证殷土或隐土俱在东北。

燕，古文作𪔐，《汉书·礼乐》注：“𪔐，古偃字”。徐隐王，颜师古云：“即偃王也”。殷、燕均读声如烟，是隐士（殷土）即燕。《尔雅·释地》：“燕曰幽州”。郭璞注：“自易水至北狄”。燕为幽州是字之声转。其地在今辽河以西，包括今河北之易水以北地区。

《帝王世纪》：“颛顼都亳”，“啻都亳”。《水经注·渭水篇》引《世本》：“契居蕃”。蕃（番）与亳、薄通。金毓黻、童书业俱谓：亳即“东北薄州曰隐土”的薄州，（金毓黻：《中国民族与东北》、童书业：《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在东北。

《荀子·成相篇》：“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左传》襄公九年杜预注：“其砥石，先儒无言，不知所在”。金景芳以砥石为西拉木伦河发源之白岔山。其证是《淮南子·坠形训》及《水经注·大辽水篇》。《世本》：“相徙商邱，本颛顼之墟”。《帝王世纪》：“商契始封于商”。商乃颛顼、契所居，颛顼、契皆都亳或殷土，在东北，此商亦当在东北。丁山在《商周史料考证》中曾列举出事实：

1·《诗·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有截在渤海北岸。

2·相土之子名昌若(即海若,北海神)其孙名稂圉(王昊,《山海经》称天昊,即东海神禺疆),均与大海神话有关,可知相土所居商邱,决在海滨。

3·《左传》昭公元年:“閼伯即为大火,或大辰之星,当然即是昭明的别名,……若按星辰分野寻迹閼伯所居商邱,又当求诸渤海之东朝鲜了”。^⑥

据丁山所论,相土所徙居之商邱在东北。其中有截、朝鲜尚需说明。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翦伯赞以为有截是氏族名,又是地名,在海外^⑦。今铁字古文作𨾏。《集韵》:古铁作𨾏。截当是𨾏之省,有截即有铁。嵎夷一作嵎𨾏,又作郁夷,古地名从邑与不从邑字同,有截即郁夷(嵎𨾏)。《史记·夏本纪》《索隐》:《今文尚书》及《帝命验》并云在辽西。《说文》土部:“嵎夷在冀州阳谷”。又山部:“嵎山在辽西,一曰嵎𨾏嵎谷也”。尹世积《禹贡集解》谓:冀州包括今辽宁西境、河北东北境。可见《说文》二说并不矛盾。

丁山说:“閼伯所居商邱,又当求诸渤海之东朝鲜”。按朝鲜初本地域名,箕子初以箕名国,称朝鲜侯是后来事。朝鲜,即《易·明夷》“箕子之明夷”的明夷。明、萌二字古通用,甲骨文中之萌字与朝字形俱同。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夷借为尸”。夷、尸与鲜字读音同。“箕子之明夷”与《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昔箕子既适朝鲜”为同一历史记事。之即适。箕子初至之朝鲜(明夷),即古目夷氏之地,为孤竹所居。《隋书·裴矩传》:殷之孤竹国,“周代以之封箕子”。在今辽宁喀左发现的箕侯铜器,与孤竹器同时出土,可知箕、竹迹近。

如是,丁山所推定的商邱,亦当在今河北东北、东北西南地区。

(三)殷先世南下之迹

史载殷先世自北而南,步入中原,其迹可寻。

《说文》邑部:“鄴,周封黄帝之后于鄴。从邑契声,上谷有鄴

县”。郑，《礼记·乐记》作蓊。丁山谓：“北京初名郑县，郑显然得名于契”。其地亦名燕。郭璞云、燕地“自易水至北狄”，今北京曾在殷土境内无疑。

《竹书纪年》：“（帝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河即河水，在今天津入海，是冥已至河水下游。

易水流域的有易，属夏，殷先世南下，便与有易经常发生冲突。

《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困民之国，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

《竹书纪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王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山海经》郭璞注引）。

《楚辞·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恒秉季德，焉得夫仆牛？……昏微遵迹，有狄不宁”。

有易、有狄即有扈。《吕氏春秋·召类览》：“（禹）功有扈，以行其教”。《世本》：“有扈与夏同姓”。该即王亥，季是王亥父冥。恒即王恒，是王亥弟。微即上甲微，王亥子。殷人先世南下至河水下游，受到易水流域的有易阻挡，因殷人三世与有易相为仇敌。

《竹书纪年》记载，夏帝泄十六年，殷上甲微灭有易。《路史·国名纪》：“邶乃上甲微所居”。邶在漳水流域，《水经注·漯水篇》：“商、漳声相近”。“汤自商徙于亳”的商，殆即上甲微灭有易南下后所居。夏桀二十一年，殷人曾征服有洛、荆等。有洛当即潞，荆即刑，其地均在河北。可知殷于夏末进入黄河以北地区。

《吕氏春秋·审分览》：“汤其无邶，武其无岐，贤虽十余，不能成功”。这个历史对比很重要。周先世公刘居于戎狄之地（豳），到古公亶父时始迁于岐，武王据此以兴灭殷。殷先世初亦居戎夷之地（殷土）、后迁于邶，成汤据邶以兴灭夏。《吕氏春秋·谕览》：“汤常约于邶亳矣”。高诱注：“邶读如衣，今兖州谓殷民如衣”。《有始览》：“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卫即邶。尹世积《禹贡集解》：兖东